

短論·觀察·隨筆

歷史研究何為？

——高華的學術遺產與思想效應

● 李公明

2011年12月，歷史學家高華的離去形成了一次震動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公共事件，強烈的良知情感和學術關懷撞擊着人們的心靈。在高華離去的背影中，人們的目光穿越學術體制而看到了一個時代的巨大悲哀，感受到自由獨立精神與學術良知的無比珍貴。可以期待的是，高華所留下的學術遺產和思想效應將會對中國人文學術研究和當代史學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現當代史研究中，二十世紀的中國是籠罩着革命硝煙和歷史迷霧的地帶，是真相與謊言搏鬥的戰場。有道德良知和深厚研究功力的學者在極受限制的條件下，熬煉着自己的火眼金睛，通過學術性的艱苦努力不斷地突破禁區、超越藩籬，而在客觀上所推動的不僅僅是學術進步，更是社會思想的進步。高華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固然是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座豐碑，其在學術上求真奮鬥的心路歷程，更有激勵來者的思想價值。這也正是在悼念高華的思潮中最為人們所感動的。

早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在當下的中共黨史研究格局中已經形成了三大板塊：

第一個板塊是在體制主宰下的正統(或主流)話語研究體系，至今仍然在精心地建構着原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解釋文本。高華曾對1980年代的正統研究體系做過這樣的概括：「在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學盛行，為聖人避諱或研究為某種權威論述作註腳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的風尚。」^①但也必須看到，近十多年來出現了某些變化，在正統近現代史研究體系中也部分地出現了重視運用史料和輕度修正解釋話語的趨向。

第二個板塊主要是以海外學界為主要的研究話語，多是以西方社會人文科學的理論為解釋框架，角度多元和觀點新穎是其重要特徵。

第三個板塊是站在民間立場上的獨立學術話語解釋系統，集中地體現了中國新一代學人的學術良知與研究功力。它強調以客觀中立的立場和對歷史的宏觀把握為前提，對史料進行廣泛的搜集和細心的考辨，避免由意識形態而產生的有意或無意的「歷史誤讀」，以求揭示歷史真實、警醒世道人心。在這板塊中的研究者既有保留體制內身份的學人，也有在體制外的自由寫作者，但是身份的色彩在這

裏已經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學術品格上相互引為同道，相互切磋。俯瞰這種學術景觀是我們思考「現當代史何為？」的基本前提，由此可以把高華的中共黨史研究定位在民間立場話語體系中最優秀的代表。

但是，在上述三大板塊的學術取向之別背後，還應該看到的是，當下的學術體制及學術資源的分配狀況存在着極大的不公平，對整體上的研究事業產生嚴重的阻礙力。這也是高華的離去所引發的「現當代史何為？」的重要思考。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的〈後記〉中，高華自述^②：

由於這是一本私人寫作，十多年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裏擠出錢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研究項目的資助，所以我的另一個遺憾是，我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採訪，如果我做了這樣的工作，一定會對本書的內容有所充實。

我還有一個遺憾是我沒有機會去莫斯科搜尋有關資料。

這種窘況與體制內主流板塊中的科研經費黑洞形成了極大反差，令人觸目驚心。

2005年5月，廣東美術館舉辦「毛澤東時代美術文獻展」，研討會在延安舉行。筆者作為學術會議主持人邀請高華出席並做專題演講，他對筆者說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令筆者大為吃驚。在延安參觀的時候，高華對各處史事如數家珍，更使筆者感嘆。一位以研究延安整風運動而聞名於國際史學界的學者，竟然在體制下得不到任何資助；高華說即使申請也不會成功，恐怕也是實情。在這種狀況中堅

持做自己的研究，是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撐的。在《革命年代》一書的〈後記〉中，高華的自述對於理解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在革命前後兩個階段中成長的心路歷程，以及獨立的民間話語解釋系統的形成，均具有重要價值^③：

說來還得感謝我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也意味着風捲殘雲、摧枯拉朽，其間有血淚、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注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進入新世紀後，資本和權力的擴張使得思考的空間更顯逼仄，面對着滲入到大學校園的項目化、數字化、標準化的壓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頭讀書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徑，也是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近兩年來，高華的三本書一直放在案頭，時常翻閱，因為筆者的研究正涉及從延安時期到1960年代人民公社這一段時期。以書本身的命運來說，高華的代表作《紅太陽》就有不少故事。筆者手上的這本是高華送贈的，但卻是他從街上買的盜版，他說做得可以，文字上沒有任何區別。但是，另一件事就曾轟動一時。2002年8月，一位律師行李中的這本書被北京機場海關「沒收」，律師為此提出行政訴訟。一審敗訴，終審勝訴，歷史學家的著述由於被非專業人士「定性」而引起了學界人士的反「定性」，這種「審讀」博弈成為對這本書的最好檢驗。

高華的《在歷史的風陵渡口》是一本論文集，收文章十八篇^④。筆者手上的這本盜版書卻印着2010年1月版，歷史學著述被一再盜版，就像高華盜

取了天火來照亮我們的閱讀。這本書的封面勒口上有高華在黃河瀑布邊上的照片，令筆者想起2005年5月26日那天和他一起拍照的情景。在廣州出版的《革命年代》收入文章三十三篇，許多文章都曾收入《在歷史的風陵渡口》，但在文章的選擇上顯然多有考慮，而且有的文章經過較大刪減。至今還沒有一本收集高華論文、講演和文章較全的文集，但筆者相信很快會有出版的一天。

在高華這些著作的序言和後記中，時有提到在他精神成長的過程中曾讀過和令他感動過的書籍，筆者想，這是我們這一代人都會很熟悉和很感親切的書單。在《在歷史的風陵渡口》的〈代自序〉和《紅太陽》的〈後記〉中，他提到很多書，其中既有《紅旗飄飄》、《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詩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氓》、《青春之歌》、《三家巷》、《紅日》、《林海雪原》、《紅岩》等，更有高爾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的《在人間》和《我的大學》、涅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的《在俄羅斯誰能歡樂而自由》、蕭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的《一個人的遭遇》、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葉集》、葉聖陶的《倪煥之》、老舍的《駱駝祥子》，以及《魯迅全集》等。他說，「正是這些作品支撐起我的人文主義的信念。」^⑥這份書單正是對上述他對中國革命之「同情和理解」，以及價值關懷的最好說明。

在高華的境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權力化、意識形態化的學術語境中，真正的學術規範、自由的探索精神、獨立的學術立場難有立錐之地。在政治學、歷史學這樣的人文社

科領域，許多被知識界和社會公眾爭相閱讀、反覆討論的學術專著，往往很難從中國的體制內獲得必須的研究資源，因而那些研究者的艱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高華的現當代史研究在思想上的巨大感召力首先來自於他的學術良知和道德勇氣，從理想主義的道德批判精神到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品格，這正是獨立的民間話語解釋系統賴以建立的穩固根基。在民間立場的研究話語體系的入口處或許可以刻一句詩：「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作為站在民間立場上的歷史學家，高華的學術遺產首先體現在以學術良知與學術功力的高度融合，從而在學術性方面做出的巨大超越，這是連體制內的一些主流史學家都不得不佩服的。

這種學術性的超越來自於高華一貫強調的學術研究原則：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窮搜博採、細心考辨、謹慎運用的史料觀，以求還原歷史語境而避免「歷史誤讀」、嚴肅揭示歷史真實的研究宗旨。關於當代史研究的史料問題，他在〈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有比較全面的闡釋，其經驗和識見可以為研究者提供借鑒。他認為「檔案是極其重要的，但鑒別、分析更為重要」^⑦；他指出政治人物的文集都為事後所編，並非完全意義上的歷史原件，在使用時要小心、謹慎、考辨、核查。領導人的年譜也一樣，他認為，這些年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有較多的取捨和省略，並迴避敏感問題^⑧。

而對於在文革中由紅衛兵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高華則認為很有價值，其中收入的毛澤東講話大都未編入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種毛澤東文集中，其真實性基本可靠。筆者和高華

在延安的討論中，也曾向他請教關於文革中紅衛兵出版物的資料可信性問題，他認為絕不能因為該資料的民間性而忽略其內在重大價值。他在文章中強調要有史學研究的基本功底、小心的鑒別與判斷和史識的修養與眼光，才能真正「讀懂這些語意曾被膨脹或修飾的浩如煙海的史料」^⑧。

他在《紅太陽》一書中對此有更深入的闡述^⑨：

由於延安整風在主流話語中是一個特殊的符號，有關史料的開放一直非常有限，這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難。但在八十年代以後，官方也陸續披露了某些與延安整風運動相關的歷史資料，除了少量檔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憶資料，這給研究者既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分析、辨別、解釋這些材料。應該說，我在中國大陸長期的生活體驗以及我對有關史料的廣泛涉獵，加強了我閱讀資料的敏感性，我逐漸能夠判斷在那些話語後面所隱蔽的東西。

在這裏，對中國的生活體驗和對史料的廣泛涉獵就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有時候閱讀海外學者的大著，雖然常有框架或觀點之新穎的收穫，但不時也會感到由於缺乏真實的生活體驗而造成的隔膜。

就高華的學術代表作《紅太陽》而言，非常難得的是，在史料來源很受局限的情況下，他能夠運用目前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資料作出如此深入和充滿洞見的研究。據稱在《紅太陽》被機場海關沒收而引起的行政訴訟案的審理中，有關人士指出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介紹，此書的一大特色就是所有資料均源於國內的公開出版物，沒有引用任何海外資料和內部資料。顯然，在像高華這樣有深厚學術功力

和求真求實精神的學者面前，企圖以封鎖資料來阻撓歷史研究前進的步伐已經是愈來愈困難了。就這個問題，筆者也曾與做過黨史研究、出版了《革命人》^⑩一書的單世聯兄有過討論，我們都認為就目前已公開的資料和學術成果而言，已經足以使研究者對歷史問題作出基本判斷、對歷史人物作出基本評價。可以說，在今天仍然試圖以封鎖資料來維持歷史謊言、繼續建構歷史神話，已經難以奏效了。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現當代史何為？」這個巨大問題前，高華對公開史料的卓越運用和深刻識見是極其鼓舞人心的，他為仍處於威權時代中的年青一代研究者樹立了很好的範例：即使只能依靠公開出版物，但只要通過精心的辨別和研究，當代中國歷史的發展真相、歷史人物的偉大與卑劣、歷史發展趨向的光明與黑暗、歷史事件的真相與謊言等根本性的問題還是會昭然若揭，所有大是大非的問題都會朗然呈現。

在對高華的學術遺產進行分析的時候，更應該看到，高華在「史料關」之上有着更基本的價值觀作為研究的動力，這更是回應「現當代史何為？」的核心命題，是民間寫作話語體系的安身立命之處。關於價值與情感的問題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在《紅太陽》的〈後記〉中，高華這樣寫道：「吾細讀歷史，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⑪筆者認為這種情感和觀念是高華真實的想法，也是對目前關於高華的悼念、評論中出現某種過於簡單化標籤的應有回應。二是他對自

己的現當代史研究的價值關懷做出了明確表述：「如果說本書的敘述中有甚麼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⑩這兩方面是認識和評價高華的基本要點，也是在「現當代史何為？」的價值觀問題上的很好表述。

在研究模式上，高華分別對「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兩種模式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⑪：

如果對「宏大敘述」作出一些結構性的調整，「革命敘事」仍有其重要意義，它表達了左翼革命主義的世界觀，為人們認識這個紛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來源，提供了一個不可取代的視角；增強「現代化敘事」的本土性，也會有助於發現中國經驗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所以這兩種敘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並不存在誰是誰非的選擇的問題。開放的、兼容並蓄的態度可以把不同的認識框架置放在一個平台上，為敘述者提供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在這個開放性的平台上，一種中立、客觀的歷史觀，即「灰色的歷史觀」，以及與此相聯繫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或許能夠成為人們認識、分析歷史現象的新的工具。

這是對於「現當代史何為？」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工具的思考，史學界也有人把高華看作是「新實證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

最後，民間話語解釋系統的「現當代史何為？」思考還有重要的一環：「修辭策略」的問題。在後威權主義時代的史學寫作中，有經驗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修辭學家」。高華更是難得的高手，其筆法之簡煉、修辭把握之準確和重現歷史氛圍之生動，都使人佩服不已，既表現出探索的自

由、學術的尊嚴，同時以建設性的努力推動着不可阻擋的學術獨立、探索自由的潮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的民間話語解釋系統在後威權時代的史學寫作中已經走向成熟，就如史料的封鎖無法阻擋探索者敏銳的目光一樣，文字的「過濾」也難以阻隔在修辭策略推動下奔湧的思想交流。

高華走了，想起和他在延安度過的日子，想起去年10月29日還和他在醫院裏討論土改運動的情景，筆者感慨萬千。歷史學家高華走了，他寫的書有更多的人在讀，會從深夜一直讀到天亮——讀書的人都相信天一定會亮的。一位歷史學家的離去成為他所書寫的歷史中的一頁，作為歷史學家還能祈求有更好的告別儀式嗎？筆者相信，在現當代史研究乃至中國當代的人文科學研究中，高華留下的學術遺產與思想效應，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課題。

註釋

①②⑤⑥⑩⑫ 高華：〈後記〉，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652；654；650；652-53；655；655。

③ 高華：〈後記〉，載《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頁391-92。

④ 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⑥⑦⑧ 高華：〈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載《革命年代》，頁325；327；331。

⑩ 單世聯：《革命人》（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

⑫ 高華：〈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載《革命年代》，頁290-91。

李公明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授、港台文化藝術研究所所長。